

国家博物馆缘何未早收蛋壳陶杯

泥质黑陶是山东最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名国家博物馆)地下展览室的一个高柄黑陶杯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安丘县景芝遗址出土的。遗址发掘了7座新石器墓葬,其中得到有厚有薄的复原高柄黑陶杯5件。国家调取了较厚的那个,把制作更有难度的轻薄型留给了山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漱耳

出土8件复原5件

景芝遗址西靠流经镇区的浯河。因为这里有一个土台(传系汉代“霸王台”)很方便取土,当地便在这里建了个窑场。1956年初冬,窑场管委会委员赵念祖带领窑工挖土时及时向上级报告挖出了古物。山东省当时的主管单位叫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此时正忙于搞全省文物普查无暇顾及,就先致函安丘县人民委员会,请予以妥善保护。到了来年10月,才派出人员实地开掘探沟,发掘了7座墓葬,共出土文物74件。其中陶器中最精美的高柄黑陶杯8件,均为细泥黑陶,轮制磨光,一般一墓一个,多为壁厚0.1-0.2厘米。另一墓出了2件,杯壁稍厚。

8件最终仅复原5件。修复后的高柄黑陶杯,上部敞口,腹稍内收,底部略有不同,柄空心,下有喇叭足。2件形同,柄部饰凹弦纹,下鼓呈球状,饰圆形和三角形的镂孔,只是通高不一样,1件19.2厘米,1件19.5厘米。柄高都是9.3厘米,足高0.6厘米,杯壁较厚;1件柄中部细,下端稍粗呈锥状,亦有镂孔,通高18厘米;1件柄部作直管状,上有弦纹,并饰三角形镂孔,通高22厘米;还有1件,直且短,无弦纹,仅有对称的四个镂孔,高18.9厘米。后3件杯壁薄如蛋壳,即大家俗称的蛋壳陶。而国家调走的并不是它们,而是通高19.5厘米杯壁较厚的那个。



安丘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高足黑陶杯。



胶县三里河出土的蛋壳陶高柄杯。

两相比较后者居上

经文物专家鉴定,高柄黑陶杯是大汶口和龙山两种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那一墓葬出2件(修复1件)的属于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高柄黑陶杯有白里透黑,经过精细打磨的外表光亮,烧制温度较高,质地较坚硬等主要特点。据考证,制作大汶口黑陶,首先要将陶土非常细密,要把采用的陶土放在水中反复淘洗,去掉杂质,然后用快轮拉坯成型,再放入高温陶窑中烧制。烧制的过程中,须不断地向窑内注水,使其产生大量浓烟,烟中的碳粒附着在陶器表面,渗透到胚体的空隙中,从而形成内外漆黑的黑陶。由于制作不易,往往被身份高贵或富有者所占有,故作为礼器只在大、中型墓葬中出现,并单独摆放在墓中显要位置,不与其他随葬品混在一起。

余下的4件属于龙山文化的“蛋壳陶”。特点用5个字才可概括:黑、亮、薄、轻、硬。即除了具有大汶口文化黑陶的黑、亮、硬的特点,多了薄和轻。这非同小可。无论是精巧程度,还是制作难度,后者远胜前者。最显著的

陶胎之薄,真是无与伦比。最薄部分盘口部位,一般0.2至0.3毫米,最厚的地方也不足0.5毫米。器身最高不超过25厘米,重量不超过70克,有的仅重40克左右,还不到一两。且质地坚硬,几乎没有渗水性,令其历经数千年而不受水土侵蚀,出土之后,以手

指弹之,尚铮铮有金属声。此特征仅为山东龙山文化所特有。也可以这么说,它是中国制陶史上鼎盛时代的代表作,现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制造”。

据称,做成一件蛋壳黑陶杯至少需要十几道工序,先得使用精密的快轮拉坯,修坯成形,研光、镂孔,通过快轮陶车上安装的专用刀具,削薄陶胎。当然这来自现代工匠的所谓“破译”。笔者认为,蛋壳黑陶的真实制作、烧制过程仍然是个谜。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要采用渗炭工艺,加入大量柴草,封闭窑门与烟囱,产生大量碳素,有意让烟把器物熏黑,从而形成黑色陶器。估计对温度控制只能靠经验精准控制,这令当今的工匠难以企及。所以,尽管不断看见有工匠或雕塑艺术家一直在模仿,但从未被超越。

历史学家倾向年代久远

虽然龙山文化蛋壳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修复的4个蛋壳陶杯并没有入专家学者的“法眼”,只有大汶口文化的那个被征调,剩余的留在山东,入藏了山东博物馆,后成为“镇馆之宝”之一。故在国庆十周年的“中国通史陈列”展览中,人们并没有领略到龙山文化蛋壳陶的风采。

直到1975年,国博(此时还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才从胶县三里河入藏了一个薄胎黑陶高柄杯。这已经过去了15年。为什么会有这种遗憾呢?盖因1959年为国选调文物的多为历史研究大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商承祚等,“纯正”的考古学家只有夏鼐。恰好《考古学报》发表了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景芝遗址的发掘报告,历史学家从文中看到出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完整器具,便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它。不过,在历史学家眼里,大汶口文化可是龙山文化的祖宗啊,遂毫不犹豫地就选取了大汶口文化那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讲,这并无不妥。

公开资料显示,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景芝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高柄黑陶杯为晚期。龙山文化因发现于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350—3950年。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是承接关系。

另一原因还是在于大家们尚未见过蛋壳陶的实物。乍一看杂志图片,差别不大,当然久远为要。殊不知,一旦上手,就会立分高下。缺乏感性认识,自然意识不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清末德文明明信片上的大明湖张公祠。

□宋建青 雍坚

清光绪十二年,河南布政使张曜调任山东巡抚。这位晚清名将督鲁5年时间内,恪尽职守,体恤百姓,最后殒命于治黄防汛任上。张曜死后,被山东民间奉为“黄河大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百姓对他的爱戴和景仰。

张曜(1832—1891),字朗斋,号亮臣,祖籍浙江绍兴。早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创建“嵩武军”,又随左宗棠赴西北镇压回民起义,后在收复新疆、阻遏英俄侵略中贡献突出。主政山东后,张曜积极招揽治河能人,有言河务者,无论当事人是何身份,他都要请来详加咨询。清光绪十六年,刘鹗便被他从河南调来山东办理河务。后来刘鹗写出名作《老残游记》,书中的山东巡抚“庄官保”,原型即是张曜,而刘鹗将自己化身为“老残”,为庄官保幕府中治理黄河河务之人。

每逢黄河决口,张曜都亲临现场,曾指挥抢修王家圈、姚家口、张村、高家套等多处决口处的防汛工作。清光绪十六年,鉴于沂口险工为山东省城之门户,张曜首将沂口险工全部建成石坝。据记载,在黄河泛滥后的救灾中,张曜还曾拿出自己的俸金,并动员其他官员捐俸助赈。他还带头植树造林,在黄河大坝和沂口通往市区的道路两侧遍植柳树,济南老



山东巡抚张曜。

张曜殉职『化身』黄河大王

——济南黄河故事⑤

百姓称这些柳树为“张公柳”。

针对黄河山东段两岸河堤窄、水涨易于漫决为患的情况,张曜督浚河道、挑淤培埝、增筑堤坝,还提出分疏结合的治河主张,在齐河赵庄、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曾建减水闸坝一座,以防异涨。张曜提出“治河如治病,泛滥冲决,此河之病也,淤滩沙嘴,横亘河流,此又致病之由也”。认为切挖淤滩沙嘴,为治河要务。鉴于人力有限,在培堤取土远时,他首创用铺小铁轨带铁车运土,曾造铁轨1080丈。鉴于当时黄河从牡蛎口入海不顺,张曜就调用机船进行疏挖,改由韩家墩入海,使河口通畅无阻。

清光绪十七年初夏,伏汛将至,张曜赴利津勘堤,又督工抢救史家坞、王阳家等处险工。工程未竣,背上发疽,被人护送回济南后病情加剧,于8月22日病逝。清廷感其功业,追赠太子太保,谥“勤果”,入祀贤良祠,并准在立功省份建立专祠。次年,张公祠于大明湖东北岸落成。

自清末至民国,张公祠成明湖名胜之一,各地仰慕者纷纷为张曜敬撰楹联,仅传世者就有30副之多,不少名联在民间广为传颂。如“伟绩竞黄河,西溯昆仑东至海;崇祠壮青岱,遥连鹤华近凭湖”(清末文人刘锡渠撰)。

张曜生前曾被皇帝御赐黄马褂,他去世后,山东沿黄百姓将其神化,认为一种背后有疤痕的黄蛇为张曜化身(他乃背后生疮而死),称之为“黄河大王”,每当河水暴涨,便请出黄蛇加以供奉,祈求大王显灵遏制水患。济南城内张公祠亦有供奉“黄河大王”的习俗,每年夏天只要在湖边发现小蛇,无论青、黄,就有人用黄布将其包起来供奉于张公祠内,闻讯前来拜祭者络绎不绝。此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虽有迷信色彩,但反映出百姓对张曜的爱戴和对其治黄之功的感念。

(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照片里的黄河故事》一书,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11月出版)